

第一章 五羊的传说 与远古社会

一、五羊的传说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端，位于东、西、北三江的汇合处。濒临南海，背靠白云山，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繁花似锦。广州是我国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最早的历史，可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如果按照西樵山细石器遗址的年代测算，则距今约七八千年了。人们又常称广州为羊城。这个名称出自一个美丽的神话，这就是流传甚广的“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

大概在周朝时，广州曾一度出现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农业失收，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

毛色的仙羊，羊口衔一茎六出的优良稻穗，降临楚庭。仙人把稻穗赠给了广州人，并祝愿这一地区永无饥荒。祝罢仙人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羊留在广州山坡。从此，广州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名称的由来^[1]。关于五仙降临的年代，有各种各类的说法。流传比较广的是周代。有人认为，这个传说大概发生于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 887）。另一种说法，五仙降临是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即战国周显王时期。还另有一说，晋朝时，吴修为广州刺史，还未到任，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背着五谷来到广州州治的厅堂上。吴修于是在厅堂上绘五仙人像以示祥瑞和纪念，并且称广州为“五仙城”。今广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观据说就是五仙人降临之地，广州人在此为纪念五仙人专门修建了五仙观，在大殿内还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据《广东通志》记载，五仙观观址历代曾多次迁建。宋代时在十贤坊（今北京路省财厅一带），南宋后期至元代在古西湖畔（今教育路一带）。明洪武十年（1377），布政使赵嗣坚将原五仙观改作广丰库，于今惠福路坡山现址再建五仙观^[2]，在今五仙观的东侧，还有一块巨大的红砂岩似脚印状的凹穴，称为“仙人拇迹”（拇迹是指脚印）。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云：“穗石洞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上有拇迹，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异也。”^[3]这个“仙人拇迹”实际上是古代珠江洪水期的流水冲蚀而成的痕迹^[4]。这里在明清两代先后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被列入羊城八景。

在广州越秀山木壳岗上，有建于 1959 年的五羊石雕像。这是著名雕塑家尹积昌等根据五羊传说而创作的，雕像连基座高 11 米，共用了 130 余块花岗岩石雕刻而成，体积约 53 立方米，仅主羊头部的一块石料，就重达 4000 余斤。五羊大小不一，主羊头部高高竖起，口中衔穗，回眸微笑，探视人间。余四只羊，环绕其身，或耍戏，或吃草，还有羊羔在吸吮母羊的乳汁。五羊姿态各异，造形优美，栩栩如生，情趣横溢，令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由历史传说而创作出来的五羊石雕亦成为广州——羊城的象征。

据广州旧志记载，周惠王令楚熊子恽统治岭南，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以朝，所以广州又称楚庭（或称楚亭）。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古代广州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而衍生出来的神话祥瑞之说，它给研究广州古代史提供了某些线索。透过这个美丽的神话，反映出古代广州先民对安定、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反映出远古广州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有一定的发展。

二、原始社会的农业与渔猎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边缘，地形主要有平原、丘陵和山地。市内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北部由白云山至越秀山，岗峦起伏，西北部属低矮的丘陵地带，而西南部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广州又处于北回归线的南缘，属亚热带气候，气候温和，多雨潮湿，年平均气温达 22.1℃，年降雨

量在 1600 毫米以上。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广州成为四季常青的城市，而且也十分适合农、林、牧、渔业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广东境内的曲江马坝狮子岩发现的“马坝人”^[5]，其年代经测定距今约为 13 万年左右^[6]，是广东最早的居民。珠江三角洲一带很早已有人类活动。1958 年，在南海发现了西樵山遗址^[7]。西樵山原是一座古火山丘，周边长约 13 公里，直径约 4 公里，山峰高度为 100—200 米，最高峰大科峰为 300 余米。其山下连接开阔的珠江三角洲平原。考古发现证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起，便有人类在山上及周围一带采石制器，劳动生息。西樵山遗址出土大量打制石器、细石器等。其细石器石料来源于火石岗、旋风岗等处的燧石和半透明的玛瑙石。这种石质坚而性脆，适宜于制作细石器。当时，西樵山一带草木茂盛，沼泽遍野，河涌纵横，岛丘错落，非常适宜于珠江三角洲早期先民从事渔猎经济活动^[8]。

在今广州西南邻近的佛山市，是珠江三角洲的腹地。这里已发现不少古代文化遗址，1977 年佛山市河宕发现了一处保存基本完好十分典型的贝丘遗址，出土大量印纹陶，还有大量水陆两栖动物遗骨等。反映出其经济生活以捕捞、渔猎为主，并出现了人工饲养猪狗等。其年代距今约 4000 年^[9]。

西樵山遗址和佛山河宕遗址是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这两个地区在古代从广义上来说是属于广州的范围。现广州地区的远郊和近郊几十年来也发现过一些早

期的居民聚落。在广州市东北郊龙洞发现有飞鹅岭遗址，属于新石器晚期的山岗遗址，出土的石器磨制双肩石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生活，是原始的锄耕农业。1982年，在广州市北郊新市发现葵涌贝丘遗址^[10]，文化堆积分布在一个高出四周稻田约20米的山岗西坡及北坡上，遗址以印纹软陶和磨制的双肩石斧为代表。在堆积层中，发现大量贝壳包括淡水生殖的蚬蚌和咸淡水交汇处生殖的螺蚌等动物。新市葵涌贝丘遗址所反映的广州先民的经济生活，是渔猎为主，也开始了原始的锄耕农业。在白云区罗岗镇发现有暹岗遗址^[11]，出土丰富的印纹陶，磨光石器已很少，还发现有青铜兵器共存，其年代可能已到春秋战国时期。暹岗附近还发现有九毛岭遗址^[12]，亦发现大量丰富的印纹陶，纹饰有方格纹、云雷纹、曲折纹、划纹、篦点纹、环带组合纹等，可辨认的器型有豆、器座、折肩罐、陶釜等。其年代和暹岗遗址相同。

从目前广州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址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广州地区的先民已使用磨制的石制工具来垦田种稻了。在这些古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石刀、蚌刀、石铲、双肩石斧及石杵、石磨盘等农业工具。在离广州稍远的马坝石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人工栽培的水稻秆和谷壳，其年代距今约4500年^[13]。证明岭南地区当时已出现原始状态的农业种植。

据《史记》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

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14]这段记载对了解岭南地区的原始农业和渔猎生产有极大的帮助。我们的先人早期的农业种植采取的就是“火耕水耨”和“刀耕火种”法。即先用火把地烧荒，然后开垦种植，烧后的草木灰成为肥料，这是一种原始的农业种植。另一种先用火烧去杂树小草，然后灌水种稻。田中的稻和草一齐生长至七八寸高时，中间除草，再放水灌田，以后田中就不再长草了，这种方法较前面刀耕火种先进，可称为“火耕水耨”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虽然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方法，但基本上没有什么优良品种和先进管理，主要是用原始的工具和粗放的方法来种植水稻，因此，其产量也非常有限。农业生产并不能保证日常的食用，而广州地区濒临南海，境内还有纵横交错的海湖港汊，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山上还有不少野生动物和各种果品，所以当时的先民已掌握种稻方法，得以大米为饭，捕鱼为汤，即“饭稻羹鱼”，而各种果实，水中的贝类及虫蛇动物等，都成为人们的食物。由于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所以不会出现饥饿无食的状况，而大家亦安于现状，无什么积累，得过且过。

三、手工业生产

广州地区在新石时代晚期手工业生产有了一定规模。当时最主要的手工业是磨光石器的制作、制陶业和稍后出现的处于萌芽状态的青铜铸造业。

广州地区（包括今珠江三角洲一带）发现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发现了许多磨制石器。就是把坚硬的石头打制成一定形状的毛坯，再加以磨制和抛光加工，制造出规整而锋利的石器，称为磨光石器。广州地区发现的磨光石器的种类和数量不少，可见当时磨光石器的制作已初具规模。其种类主要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锄、石铲、石镰、石矛、石戈等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磨制的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在广州的暹岗、九毛岭、新市葵涌遗址、东郊飞鹅岭和番禺、花县、从化、增城一带都有这一类磨制双肩石斧发现。南海西樵山、东莞万福庵村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一带都有发现。当时，距今广州市区中心仅数十公里的南海西樵山有一个石器制造场，其生产的霏细岩双肩石器在广州地区的遗址普遍都可找到。由此推测当时广州地区有些居民上山采制石器，而有些则是通过产品的交换，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获得石器。这反映出广州地区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和原始部落联盟的加强。

陶器的制造是广州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一种重要手工业。由于学会了制造陶器，我们的先民可以走出洞穴到山岗台地来居住了。陶器可以储水和实物，也可以煮熟食物，使先民的经济生活较以前更为丰富多采。这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斗争中的一次重大的发明创造。在广州地区发现的许多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不少各种各类的陶片。而这些陶片的表面，又压印有菱形、方格、米字、曲尺、云雷纹等。很多花纹图案都是几何图形，所以被称为“几何印纹陶”。它和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流行的彩陶和黑陶有所不同。

广州地区早期制造的陶器，主要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泥质陶是用筛选、澄清过的陶土烧成的陶器，用来做食具，如碗、钵、盆、壶之类。而夹砂陶在陶土中掺有一定的沙子制成陶坯，入窑烧造，主要用来做炊煮的器具，如三足鼎、鬲、釜等。陶器的制作工序，开始是筛选陶土制作陶坯，把和好的陶土搓成泥条，一圈圈盘叠成各种陶器器形，再在陶坯外表用手沾水抹平，使陶器表面光滑。后来，发明了“陶轮”，即用木头制成转盘，把和好的陶土放在盘上，转动木盘，用双手盘筑泥条，修整陶坯的口沿，再拍印上各种花纹，最后入窑烧制。据测定，广州地区发现秦汉以前夹砂陶属软陶性质，其烧成的温度在 680°C — 800°C 之间。而泥质陶器烧成的温度大约在 1000°C 左右。广州地区早期的陶器，除了大多数表面有几何形图案外，部分还有绘彩和施釉。

岭南地区矿藏丰富，燃料充足，具有发展青铜冶铸的良好条件。但青铜铸造需要经过采矿、提炼、制模、熔铸和修铸加工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需要专门的技术人才，而这一地区由于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青铜冶铸业明显比中原慢了一拍。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大概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两广地区出现了青铜铸造业。考古学界把两广地区发现的秦汉以前的青铜器，称之为“先秦青铜器”。“先秦青铜器”在广东地区，发现有约 600 余件，其中大多数是具有南越族地方特色的，如比较小型、体积较薄的武器、工具和杂

器等。铸造技术简单，工艺也比较粗糙。主要器型有羊角钟、盘口鼎、越式匕首、靴形钺、扁茎剑、篋刀、人首柱形器等，这些铜器在其他地区很少见到，具有浓厚的南越色彩，是本地所铸造的。广州地区发现的“先秦青铜器”的数量和类型还比较少。1965年在市东郊的暹岗遗址中，发现五件青铜器，有刀、矛等，从其型款分析，应是当地铸造的。另外，在增城、从化等地，亦发现有“先秦青铜器”。由于数量和类型少，我们对广州地区先秦青铜器的铸造业只是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广州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应是在南越国时期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南越王墓出土 500 多件青铜器，其器型有鼎、烤炉、釜、甑、壶、钎、提筒、盆、鉴、甬、熏炉、灯、镜、带钩、牌饰、印章、编钟、铎、虎节及戈、矛、剑、弩机和车马上的装饰等，是广州地区青铜器冶铸技术最高水平的标志。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由于铁器和漆器的大量使用，青铜器已逐渐屈居于次要地位。而在南越国中，青铜器仍处于黄金时代。

四、南越族的兴起及其特征

南越族是居住在我国岭南地区的古老民族。岭南是指五岭以南。五岭位于我国的湘、赣、粤、桂边界上，五岭为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这些山岭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将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分隔开来。先秦时期，由于岭南与岭北地区的交往非常困难，岭南的历史发展

比岭北慢了一步，因此被视为“南蛮”之地和化外之区，或者叫“瘴疠之乡”。南越族作为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族体，是由岭南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土著居民发展起来的。其族体形成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当时，中原地区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岭南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还没形成国家，只有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的君长。

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岭南地区很早就有人居住。1958年发现的广东曲江“马坝人”，距今已有 13 万年历史，就是说至少 1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在岭南繁衍、生息。大约 1 万年前，岭南先民，主要聚居在西部、北部的天然洞穴，到四五千年前，先民的人口已大量增加，他们的居住点，主要在大小河流和湖汊港湾附近的台地上。这些居民，就是秦汉时期被史书称为“南越”人的祖先。据人类学家研究和测定，四五千年前岭南的土著居民和汉人在体质特征上是有一定差别的，岭南土著主要特征是普遍身材较矮，面部较狭小，眼睛较大而鼻梁较低，颅骨也较突出，皮肤较黑。今天的黎族、壮族等，仍保留不少古代越人的特征。

在史书中，秦汉之前中原人对岭南民族的称谓多种多样，有百越、扬越、外越、陆梁、西瓯、骆越、瓯越、南瓯、仓吾、雕题、南蛮、蛮夷等名称，他们主要都是指聚居在今两广地区的越人。“南越”一词，最早见于秦汉史籍。

《史记》中通称为南越，而《汉书》中又把南越称为南粤，今天广东省的简称“粤”即来源于此。南越族是我国江南地区百越的一支。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云：“自交

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不尽少康之后”。这些记载表明越族是分布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中国古代民族之一。

从目前材料来看，岭南越族的分布地区，大部分就是今天的两广地区范围。岭南越族到底可分为几个支系呢？从大范围来说，主要可分三支：一支为南越，分布在今广东中部和北部，即今天的珠江三角洲一带。一支为西瓯，分布在今广西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另一支称之为骆越，分布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 and 越南的北部。也有学者认为西瓯和骆越同属一个支系，应称之为瓯骆。

今广州地区在先秦及秦汉时期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并且是南越族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南越族有不少与中原汉人不同的生活习俗，而作为百越的一支，在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上，与百越族有共同之处。南越族主要有如下特征。

1. 善舟习水。

《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南越族聚居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水网纵横，古人日常生活常常要和水打交道，所以，南越人善用舟。

2. 断发文身。

这是越人的共同习俗，南越族也很流行。断发就是把头发剪短，文身就是在身上和脸上刺上各种花纹图样。一些学者研究认为，越人善用舟戏水，断发文身后“以像龙子”，下水可避蛟龙之害

3. 干栏巢居。

秦汉时期，广州地区越人很盛行住“干栏”式建筑。广州西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陶屋、陶仓、陶冢等建筑模型，大多数是干栏建筑，而广州的一些汉代木椁墓，椁室亦分为上下两层，显然是仿照生人所居住的干栏建筑。所谓干栏是用竹木等建房材料，将房子搭成两层，下层养牲畜，上层住人，还可以避潮湿，防止毒蛇、野兽对人的侵袭。

4. 喜食蛤贝。

这是因为南越族居住地靠海和湖，多水产，渔猎经济在此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贝类、蛇、蚌等，是当时南越人的日常食物。古代中原人士对南越族这一习俗不甚理解，所以戏称南越人为“南蛮”。

5. 拔牙之俗。

这是不少民族都流行的一种风俗，又称为“凿齿”，是一种表示成熟或婚俗的标志。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一些拔牙遗骨，说明南越族拔牙之风，起源很早。

6. 迷信鸡卜。

商周时期，中原汉人用龟牛骨来占卜，而岭南越人则用鸡骨来占卜。其占卜过程是：杀鸡取鸡头骨，在火上烤，根据鸡骨受热开裂的纹样，来判定所卜事情的凶吉。

7. 几何纹陶。

南越族使用的陶器，表面大多数压印有方格纹、曲尺纹、米字纹、水波纹等。学术界称之为几何印纹陶器。这和

北方地区主要使用彩陶和黑陶等有所区别。几何印纹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使用至西汉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几何印纹陶器最发达的地区。

8. 倚重铜鼓。

铜鼓是南越族的一种权力象征。部落发生战争期间，铜鼓是发号施令的工具。铜鼓又是南越的一种乐器，还被用来祭祀、进贡和赏赐，同时，还被用于作随葬品。南越铜鼓的用途极为广泛，但最主要的是作为礼乐器。铜鼓在南越族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注释：

- [1] 见明朝黄佐编撰《广东通志》卷二百十六；同治年间重修的《广州府志》卷八十八中《五仙观》条目；屈大均：《广东新语》。
- [2] 参见明朝黄佐编撰《广东通志》卷二百二十九有关五仙观沿革记载。
- [3] 屈大均：《广东新语·穗石洞》。
- [4] “仙人拇迹”今仍完整保存在五仙观旁的广州市惠福西路第二小学内。五仙观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祭祀五仙的神庙，现仍保存有头门、后殿、岭南第一楼（钟楼）等。观内还保存有宋至清代的碑刻 14 块及石麒麟一对。
- [5] 吴汝康等：《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类型人类化石》，《古脊椎与古人类》1959 年 4 期。
- [6] 马坝人的年代，1985 年由年北京大学实验室用铀系法测定距今为

12.9 万年（正 1.1 万、负 1.0 万年）。

- [7] 何纪生：《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考古》1982 年第 12 期。
- [8]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 年第 1 期；曾琪：《西樵山——珠江流域原始文化探索》，《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 [9] 杨式挺：《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1981 年第 3 期。
- [10] 陈伟汉等：《广州新市葵涌贝丘遗址的试掘》，《广州文博通讯》1982 年第 4 期。
- [11]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郊区暹岗古迹遗址调查》，《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1977 年出版。
- [1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广州罗岗九毛岭遗址试掘》（未刊稿）。
- [13] 杨式挺：《谈谈马坝栽培稻的发现》，《文物》1978 年第 7 期。
- [14]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第二章 秦统一岭南与南越国建立

一、秦统一岭南

早在先秦的时候，岭南地区就是越族聚居之地。当时，岭南还未形成国家，只有各种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酋长。居住在广西的越族称为“西瓯”，有君长译吁宋^[1]，广州地区则是南越人。秦统一岭南以前，这里由各个部落联盟的君长统治。据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先秦时期南越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部分地区开始过渡到奴隶制社会阶段。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又下决心将千里之外的岭南也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关于秦统一岭南的战争，平定岭南并设置郡县的时间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发诸尝逋亡人、赘

嫪、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2]但统一战争开始于何时，史家各说不一。一说是“始皇二十五年，遣王翦南征百粤，略定陆梁地，以为南海、桂林、象郡”^[3]。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而近年来比较为史家所接受的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19 年。

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 50 万大军^[4]兵分五路，向岭南进军。其中一军驻扎于余干（今江西余干）；一军扼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一军占据九疑要塞（今湖南宁远县境）；一军守在谭城之岭（今广西桂北越城岭）；还有一军下湟溪，顺北江而下占据了番禺。当时，岭南土著越人各属自己的“君长”，互不统属，力量分散，在装备精良的强大的秦军进攻下很快就瓦解了。然而，古代越族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当他们醒悟过来之后，又逃入山林密谷，不肯为秦虏，并迅速聚结起来，“相置桀骜以为将”^[5]。越人利用自己熟悉的地形和善于爬山越岭弄舟击水的长处，白天纷纷躲藏在山高林密处，夜晚聚集在一起偷袭秦军，使秦军疲于奔命，顾头不顾尾，孤立无援，陷入困境，连主帅屠睢也被越人杀死。秦军的攻势一度减弱，出现“三年不解甲弛弩”的秦越对峙相持局面。

由于当时秦军的给养要从岭北翻山越岭从陆路运来，高高的五岭是一座难于逾越的屏障。对越战争的长期僵持对秦军极为不利。为解决运输和给养问题，秦始皇派了“监”史禄率领秦军和民工等在海阳山（今广西兴安县境）开凿了沟

通南北水运的 60 里长的水道——灵渠^[6]。灵渠引湘水入漓水，漓水又汇入珠江，从而沟通了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灵渠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以水运粮解决了南下秦军的后勤给养大问题。从秦汉起至隋唐，灵渠一直是沟通五岭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对岭南文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灵渠解决了粮草补给问题后，秦始皇即增派将卒，重新部署平定岭南的战争。秦尉任嚣代替被越人所杀的屠睢任主帅，率领赵佗等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秦军得到人力和粮草的极大补充，特别是楼船之士即水军的参战，战斗力得以极大的加强。任嚣、赵佗吸取了屠睢失败的经验，步步为营，筑营守险，避免孤军冒进。秦军中有一部分留守在岭南的各个逾岭关隘，如广西的灵渠秦城严关，广东的横浦关、涯口关、阳山关和湟溪关等。任嚣、赵佗除了懂得对越用兵政策之外，还善于和集越人，因而很快就扭转了战争的局面，击溃了越人的反抗，平定了整个岭南地区，还杀死了西瓯越君长译吁宋。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秦统一岭南的事业终于完成了，岭南地区从此纳入秦朝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版图。

二、南海、番禺初置郡县

秦始皇平定岭南后，在原来七国地区建立三十六郡的基础上，又在岭南地区设置了南海郡（今广东大部分地区）、